学术专论

咸同之际江南政治变动与市镇权力的格局转换

——以吴江盛泽镇为中心

陈 岭

[摘要] 咸同之际江南政治变动使得盛泽镇的传统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以科甲为代表的传统士绅之家在战争中遭受破家之难，而新兴商人家族则通过各种政治运作，不仅发展成亦商亦仕的商绅之家，而且还成功地延续了其在战争中形成的权力格局，掌控战后盛泽权力。围绕咸同之际盛泽镇权势格局转换的细致考察，为探源晚清绅商阶层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同时，也揭示出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江南市镇的经济网络，更重构了市镇内部的权力格局。

[关键词] 江南 盛泽 政治变动 权势转换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9）－01－0052－14

江南市镇史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由傅衣凌等学者开创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可谓硕果累累，成就斐然。在此过程中，市镇经济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绝对核心的位置。近年来，随着江南市镇研究视域的扩大，市镇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得到学界关注。① 有学者指出，“家族的兴替与地域权力格局，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等问题，是摆脱经济视角而对市镇历史的另一重展现”②。本文以吴江盛泽镇为个案，③ 透过咸同之际江南政治变动，分析地方势力如何在

[收稿日期] 2017-11-27
[作者简介] 陈岭（1983—），男，井冈山大学江西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承应用协同创新中心、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吉安 343009；chenlinggood@163.com

① 小田：《清末民初江南乡镇社会的权力结构变动》，《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潘中祥：《近代江南市镇权力中心的演变——以湖州南浔镇为例》，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杨茜：《聚落与家族：明代紫隄村的权势演替与地域形塑》，《史林》2016年第2期；杨茜：《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变迁与市镇权势更迭——以江阴县长泾市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等。

② 杨茜：《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变迁与市镇权势更迭——以江阴县长泾市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③ 涉及盛泽的论著非常之多，几乎所有江南市镇史研究的成果都或多或少有所论及。相关回顾可参见罗婧：《近40年来盛泽镇研究述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近年来专论盛泽的成果主要包括罗婧：《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张海英：《明清政府对盛泽镇的管理》，《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三期）》，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5-25页；游欢孙：《从市场到区划：清至民国江南市镇区域变迁——以盛泽镇为例》，《学术月刊》2013年第9期等。

战乱中进行权力场域的争夺。实际上，咸同之际的战争作为近代江南市镇发展的关键节点，不仅改变了市镇的经济网络，[①] 更重构了市镇内部的权力格局。

一、战前盛泽镇的权力格局

吴江县位于太湖之滨，苏州之南。盛泽镇则位于吴江县治东南六十里，距京杭运河五里之途。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相比周边处于运河线上的重要市镇如平望、乌镇、南浔等，交通位置显然处于劣势。这也使得盛泽在发展早期仅作为沿运河市镇的腹地，附属于王江泾新杭绸市而存在。[②] 关于盛泽镇的发展脉络，乾隆《吴江县志》有较为清晰的描述："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谊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③] 可以看出，盛泽镇真正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商业市镇乃始于清代前期。

明清时期盛泽镇的科举事业，在整个吴江县虽然不算最为突出，但也产生过 24 名进士、77 名举人，仅次于松陵与同里。[④] 明嘉隆年间，盛泽"日繁民齿，声文过昔，黉宫蜚声，骚墨游咏"。[⑤] 清乾隆年间，周霈更誉之为"人文蔚起，科第相望"。[⑥] 盛泽的族姓构成除了众多分散的移民姓氏，在数百年的发展中，虽然因商业发展、移民众多等因素导致宗族势力相对弱小，但也形成了几家所谓的望族。据乾隆《盛湖志》记载，"诸姓，惟许、仲、归、吴、王、沈、汤、卜八姓为久"。[⑦] 不过居住长久并不全然意味着权势最大。就科第而言，在明清数百年中，盛泽主要的望族包括仲氏、周氏、郑氏和王氏等。[⑧]

周氏一族在明代声望卓著，明清两代曾中 6 名进士、18 名举人，占盛泽中举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不过从时间上来看，绝大多数都产生在明代，彼时盛泽的商业还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盛泽王氏主要有两大家族，一为两宋之际从北方迁入之琅琊王氏，即《盛湖志》所记之"老八姓"之一。其始祖为王复，后世多以书香传家。乾嘉道年间其族人王楠及其子王鲲、孙王致望共同经营之话雨楼，为江南著名藏书楼。同时王家三代还编撰了保存盛泽史料的重要文献，如王鲲之《松陵见闻录》《盛湖诗萃》，王致望之《舜湖纪略》《盛湖诗萃续编》等。就科第言：王濂为附贡生，王楠为太学生、镇江府学训导，王鲲为太学生、候选直隶州州判，王致望为贡生，王致望子王壬泽为同治癸酉拔贡，"选拔第一"、"会覆第一"。[⑨] 可见王家四代人所获功名都算不高，其身份标识更多体现在艺文、善举、修志诸方面。盛泽镇上还有另一王姓家族，明中叶由嘉兴秀水县新塍镇迁入，嘉道之际因经商而致富。[⑩] 关于其家族信息，后文将详叙。其他如卜氏、沈氏、徐氏、陈氏、郑氏等也都在科第上有所建树，但其家族兴盛大多缺乏长时间的连贯性。

迨至清道咸时期，仲氏家族因科第兴盛，成为彼时盛泽镇上最具权势之家。盛泽仲氏始祖为仲子四十九代嫡长孙台州知府仲基，两宋之际从山东济宁迁居吴江，其后裔以科举之盛而著称。据清代各时段所纂修之《盛湖志》统计，同治以前仲氏家族所中功名者如下：

---

①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可参考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73-109 页。

② 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82-184 页。

③ 乾隆《吴江县志》卷 4《镇市村》。

④ 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第 207 页。

⑤ 乾隆《盛湖志》题首"盛川题景记"。

⑥ 乾隆《盛湖志》"仲周霈后序"。

⑦ 乾隆《盛湖志》卷下《人物志・荐举》。

⑧ 盛泽镇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盛泽镇志》，第五章第二节"盛泽望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452-454 页。

⑨ 《王壬泽履历》，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 384 册，成文出版社，1992 年，第 99-115 页。

⑩ 后世论著多将盛泽"二王"混为一谈，实误。如前揭《盛泽镇志》，第 453 页等。

仲嘉，原名景亨，字孟嘉，号子服，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山东青州府昌乐知县，历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兵部职方司员外等职。

仲绍颜，字尔膺，号克三,万历三十四年副榜。好读书，工诗文，与卜舜年齐名，早卒。

仲枢，字拱宸，号亦山，景亨从曾侄孙，康熙五十二年举人。官知县、宗人府宗学教习。

仲周霈，子思则，号资万，仲枢胞侄，雍正二年举人。官宗人府宗学教习、泰州学正、直隶定州深泽县知县等职。

仲忠孚，字有威，周霈子，监生。历任河南巩县、鹿邑县、南阳县丞。

仲步墀，字集川，号莼溪，周霈次子，乾隆二十五年北榜副贡。

仲锦昼，忠孚子，监生，博综经史，其子孙游庠序中科第者踵接。

仲锦奎，字星联，步墀子，乾隆五十一年举人。

仲廷机，字组缦，号支仙，周霈玄孙，道光十五年举人。官浙江严州知府。

仲孙樊，字候补，号博山，周霈玄孙，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中塘海防同知、浙江知府。

仲孙懋，字赏延，号兰舫，孙樊弟，咸丰十年监生。安徽军功，授浙江宁绍道台。

仲朝桢，号巢民，廷机弟，咸丰九年附贡生。补浙江寿昌知县，署分水、太平、嵊县知县。①

可以看出，仲氏一族在整个清代前中期五代人中每代都有人中举人及以上功名，延续一百余年。这种百年科第的延绵不绝，对于基层社会的权力控制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道光年间，仲家连续有人高中进士、举人等功名，成为彼时盛泽镇上当仁不让的权势之家。正如周庆云为同治《盛湖志》做序时所言，“门胄以仲氏为巨擘”。②

盛泽镇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典型移民特质的江南市镇。明朝初年，还是“以村名著，居民仅五六十家”，嘉靖年间才“渐成市”。③ 盛泽最初的移民来源主要包括绍兴、苏州以及安徽等地。在盛泽丝绸业发展之前绍兴人多来此地养鸭做活。商业兴起后，苏州、安徽人陆续到此经商。④但早期的移居者主要从事劳动役力方面工作，很难说能对镇上的权力有所分享。但晚明以后移民至盛泽的家族中，很多通过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也激发了商人家族对地方权力控制的诉求。

小田在讨论江南乡镇社会的权力结构时曾言及，“在江南乡镇社会，传统的整合运作力量有两支：一是乡绅，一是家族。乡绅充当乡镇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媒体，是国家行政权力在乡镇社会中的实际操作者，反映着乡镇社会整合中的地缘关系。代表着血缘整合力量的是家族长者”。⑤这当然是针对江南乡镇的整体而论。盛泽镇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移民特质与商业的兴盛。盛泽商业从晚明才开始兴起，清初才正式列入镇的行政级别进行管辖。发展上的后起，使得盛泽缺乏其他市镇所存在的强有力宗族势力。换言之，在盛泽，最重要的地方权力争夺者当是在科举中取得功名的官宦之家与经商致富的富商之间。

至清中期，盛泽镇上聚居了很多富商家庭，而其中从新塍镇迁入的王氏家族最为著名，王氏最后发展成全镇首富。王氏祖籍嘉兴府秀水县之新塍镇。据《舜湖王氏家谱》载：“望山公，不详其讳，以字传。先世江浙散处，公隐居于吴江之茅塔村，是谓始迁祖。”⑥《王元松家传》云：“十世祖望山，于明中叶始居秀水之新塍里。”⑦ 盛泽、新塍两地虽分属江、浙二省，但

---

① 据乾隆《盛湖志》卷下；同治《盛湖志》卷 8、卷 9；光绪《盛湖志补》卷 2 整理。

② 同治《盛湖志》，“周序”。

③ 同治《盛湖志》卷 1《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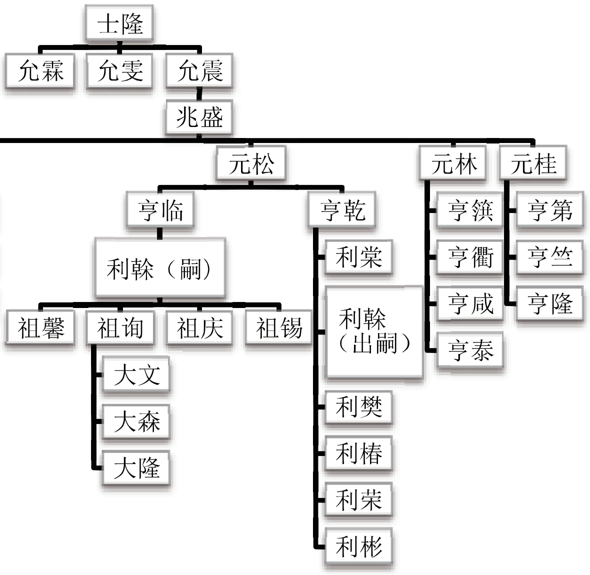
④ 罗婧：《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第 228 页。

⑤ 小田：《清末民初江南乡镇社会的权力结构变动》，《历史档案》1998 年第 2 期。

⑥ 王大隆续撰：《舜湖王氏家谱》卷 2，王大隆辑：《秀水王氏文献丛钞》第七编，稿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⑦ 顾广誉：《悔过斋文集》卷 6《王封翁家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60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599 页。

实际上仅相距二十余里。据《舜湖王氏家谱》卷四载，其主要世系如下：士隆（1691-1778），字端揆，举乡饮介宾，有子三：允震、允雯、允霖。允震（1711-1788），字伦先，号敬天，有子一，名兆盛。兆盛（1744-1820），字际唐，号霞村，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乡饮介宾。兆盛有七子，其中二子、六子早殇，故有时其家族文献中亦记载为五子，即长子元桂、三子元林、四子元松、五子元校、七子元相。关于彼时王家之经济条件，《王师晋家传》云："时家未丰裕，兄弟五人不能自食其力。"[1]《清故湖北通城县知县王君家传》载："始祖望山相传明贵族，遭鼎革，寝姓氏，教子孙读书务农，数世不仕，民无能称也。曾祖元松业商致富。"[2] 可见王氏家族在清中期以前，仍以务农为业，家业未丰。其家族之兴起乃始于元松、元相两兄弟共同经商后致富。



舜湖王氏迁居盛泽后主要世系

资料来源：王大隆续撰：《舜湖王氏家谱》，王大隆辑：《秀水王氏文献丛钞》第七编，稿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至道咸之际，王氏兄弟通过经商把王氏家族发展成盛泽镇最为富有的家族之一。不过随着时事变幻，江南社会秩序在经过"道光萧条"之后也开始不断恶化，各种社会恶势力最终汇入战争的大潮，咸同之际的盛泽面临着一场新的风暴。

二、战争、势力交织与家族命运

在太平天国战争前期，太平军面对腐朽不堪的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东南。但至1856 年天京事变之后，情形急转直下，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重重围困。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用奇袭杭州、围魏救赵之计解天京之围，随即江南战火遍地。战乱中的江南社会剧烈变动，在清军与太平军军纪的双重失控下，各种社会恶势力纷纷抬头，一

① 王伟桢：《王师晋家传》，王大隆辑：《秀水王氏家传》，稿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② 高向瀛：《清故湖北通城县知县王君家传》，王大隆辑：《秀水王氏文献丛钞》，稿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起摧毁了江南社会的秩序，逃难深刻地嵌入时人的日常生活。①

实际上，战前清政府在盛泽镇设立的巡防力量非常薄弱。顺治四年（1647），清政府在盛泽设立盛泽汛。随着盛泽经济的发展与市镇规模日益扩大，从乾隆五年（1740）开始，政府“移驻县丞，以资弹压”。②县丞为正八品衔，主要职能包括稽查赌博、窝娼、私宰、私铸、奸慝、盗贼、地棍、打降八事，同时兼理水利。③盛泽讯的额设步战守兵为四十名，主管者为轮防千把总（千总正六品，把总正七品）。不过除掉随丁八名以及派防所辖五汛二十七名外，实际上常驻镇上的只有五名。雍正七年（1729）开始，添设外委轮防千把总（千总正八品，把总正九品），但千总、把总名下只有配步战守兵各一名。④可以看出，盛泽镇上正规的驻镇守兵只有寥寥数员，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显然难以应对。⑤

从嘉庆年间开始，盛泽镇上及周边区域开始出现一种称为枪船的群体。起初只分布在太湖滨北舍港一带，因眼力最准，多以枪击鸟为生，同时因船小而行捷，故而有时帮助往来商贾运载货物，“未尝害及良民也”。⑥加上长期驻防在盛泽的把总赵长庚尽心值守，“其驻汛，每夜必自出巡，街衢僻甚周行殆遍，角声至黎明方止，里民安之。”⑦但自道光年间开始，枪船开始恶性发展。⑧

枪船兴起及其向恶性方向发展之时，正是学界所谓的“道光萧条”时期。王健曾依据道光前期嘉兴竹林里乡居士绅沈铭彝的日记，细致描绘了“道光萧条”给江南乡村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沈铭彝的笔下，“天灾频仍、经济萧条，导致江南乡村主佃矛盾加剧、社会日益不靖、士风浇漓以及信息交通不畅，进而加快了地主城居的步伐，加剧了乡村社会的无赖化进程，加之地方政府控制能力减弱，江南地方社会更巨大的变乱呼之欲出。”⑨盛泽镇与竹林里相距不到百里，农村社会面貌应该与其相似。农村的衰败必然导致大量无业游民的产生，而这些人成为这一时期枪船群体的主要来源。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南京，江南地区人心惶惶，居民迁徙纷纷，枪船开始抢劫避难之民。此后，“其间六、七年中，苏、嘉、湖一带，人心渐觉浮动，桀骜不驯之辈，以保卫乡里为名，打造枪船，结党横行”。⑩而官方因为县以下驻防力量薄弱，也不断招募枪船为其所用。于是“官之下乡催粮，差之解征拘犯，无不用枪船为卫。值苏州有广棍之扰，吴江有粮匪之集，大王庙有抗粮之案，湖州有拒捕之变，兵勇少，姑以枪船佐之，实无能为役”。⑪得此良机，枪船势力借势迅速壮大，并成为江南地方权力的重要掌控者与害民群体，“恃众横行，睚眦杀人，戕官拒捕”，“日则横刀过市，骚扰闾阎。夜则十八成群，四出劫掠，抢孀逼醮，掳人勒赎，恣所欲为，盖至是而枪船赌匪之为祸烈矣”。⑫

---

① 关于此时江南士民的逃难研究，可参陈岭：《“天不仁兮降乱离”：咸同之际江南士民的逃难与日常》，待刊。而值此之际，女性在战争中的际遇又尤为悲惨与特殊，细致讨论亦可参陈岭：《闺门之外：咸同之际江南才媛的战争记忆与战乱言说》，《浙江学刊》2018 年第 1 期。

② 同治《盛湖志》卷 1《沿革》。

③ 同治《盛湖志》卷 7《官制》。

④ 同治《盛湖志》卷 7《官制》。

⑤ 关于明清政府对盛泽镇的管理，还可进一步参考张海英：《明清政府对盛泽镇的管理》，《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三期）》，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5-25 页。

⑥ 佚名：《寇难琐记》，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69 页。

⑦ 同治《盛湖志》卷 7《政绩》。

⑧ 光绪《盛湖志补》卷 4《旧事》。

⑨ 王健：《居乡之苦：〈沈竹岑日记〉所见“道光萧条”与江南乡村社会》，《江海学刊》2013 年第 6 期。

⑩ 万流：《枪船始末》，《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 125 页。

⑪ 光绪《盛湖志补》卷 4《旧事》。

⑫ 李光霁：《劫余杂识》，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 5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11 页。

盛泽镇的枪船势力在咸丰年间主要以孙七为首，也是太湖南岸最早兴起的枪船首领之一。《避寇日记》称其“颇通文义，能诗”①，并且“精于拳技，赌博为生，有枪船四五十艘”，“有德于镇，镇之人无贫富皆善之”。② 这种描述与上述枪船兴起之时，以击鸟为生，并不害民的叙述也基本一致。咸丰三年，浙抚以捐班湖北道余安清为嘉兴防堵局主，而以知县仲孙樊带兵驻盛墩防堵。仲孙樊是前述盛泽科甲世家仲氏家族的重要人物，直接引用枪船头目孙七为团练首领，“招聚各赌局枪船为团练勇，各赌魁皆附焉”。③ 枪船势力此后在盛泽得以迅速发展。咸丰八年（1858），孙七病死，其党伙多散，余者奉孙七之子孙金彪为首。金彪小名四喜，年十四，为武庠生，尚在血气方刚之龄。同时，盛泽镇上的另一股枪船势力亦大起，为首者名朱法度，又称朱法大，绰号“小鸡法大”，曾经为孙七手下，见金彪年幼，则“欲并其众”。④

咸丰十年二月，太平军攻陷广德、长兴、杭州等地。但此时江南各地守备空虚，驻兵多老病，不堪为用，嘉兴府县不得已乃招聚枪船以及博徒之善斗者为兵，对枪船首领如沈牌士、沙哥、卜小二、小鸡法大等皆“赦罪授职”。结果枪船响应者数以千计，一时间江南河流中枪船飞渡如织。⑤ 盛泽富绅纷纷约各店出税给饷，以朱法度的枪船群体为主体组织团练以保镇。

闰三月，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直取江南。四月十三日，太平军兵不血刃占领苏州。不久，在吴江县丞吴翔鳞的支持下，朱法度在盛泽镇西边成立了代表清军势力的团练局，并且曾经重创过太平军。⑥ 随着势力壮大与官方的支持，朱法度在盛泽“率其属与镇人寻仇摘隙，索银钱，且言将诛灭镇人之有怨者”。⑦ 据盛泽人沈鹏记述，“尤对富绅王永义家，强索威胁，不堪其扰”。⑧ 可见，朱法度所言“寻仇摘隙，索银钱”者正是王家。时人记载，“王永义”为盛泽富商，“平素恃强豪横，为暴乡里”⑨，见朱法度寻仇，则深为不安。随后太平军占领嘉兴，王家五月初四日第一时间遣人表示归顺。

实际上，关于“王永义”的记载和叙述，学界多有舛误。“王永义”在目前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中，多将其误记为彼时的一个富商人名。这也直接导致几乎所有的太平天国史论著中都将“王永义”视为一个人名。实际上，“王永义”是王氏家族开设的一个绸行名字，并非实有其人。万流在《枪船始末》中言：“王固绸商，设王永义绸行，为镇首富，其后裔即光绪末年名医王斗生及翰林院编修王大钧，广肇罗道王祖庆，收藏家王祖锡，所谓镏香阁主人者是也。人以为保全盛泽，不至糜烂之报云。”⑩ 王祖锡之兄王祖询有一子名王大隆(1901-1966)，字欣夫，号补安，为当代著名文献学家。王欣夫曾任复旦大学文学系教授，正是他所保留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珍贵家族史料，才使笔者得以对文献中的“王永义”家族展开进一步分析。

太平军进攻江南时期，王氏家族率先向驻扎嘉兴的太平军听王陈炳文进贡示降，据《盛川稗乘》载：

> 咸丰十年五月初四日，王永义遣枝珊及宋七达子、仲瘪嘴随同小王五官赴贼营远迎进贡，用红单开列王元相名为首。王元相者，四品衔王守谦、捐纳郎中王恩寿、贡生王家鼎之父也。献枣子一桶，银锭十只，雄鸡十只，用黄旗写“早定一统，雄冠三军”八字谐声献媚，丧心病

①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7页。
② 沈云：《盛湖杂录》，“孙金彪轶事”，1918年铅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第13a-13b页。
③ 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续编》第8册，第257页。
④ 万流：《枪船始末》，《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27页。
⑤ 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续编》第8册，第8页。
⑥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183页。
⑦ 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续编》第8册，第259页。
⑧ 沈鹏：《我的回忆》，转引自李炳华：《盛湖巨商“王永义”号》，《吴江文史资料》第11辑，第171页。
⑨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83页。
⑩ 万流：《枪船始末》，《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27页。

狂。贼渠邓光明大喜，见枝珊善于应对，知能办事，即派小王五官为军帅，把守盛泽，而以枝珊为师帅，协同把守。后见小王五官不能办事，改派王恩寿为军帅。王氏弟兄叔侄聚谋，恐贼众诛求科派，后难为继，若不出面，又恐无权失势，不能号令一乡，乃荐沈枝珊为主，而以其侄王子青副之。①

遍查《舜湖王氏家谱》未见“王永义”之人名。王家因王元松（1773-1850）、王元相（1787-1873）两兄弟经商致富而各捐官名。捐纳四品衔王守谦即族谱所载之王元相长子亨谦（1810-1864）、捐纳郎中王恩寿为族谱所载王元相次子亨益（1819-1874）之官名、贡生王家鼎为族谱所载王元相之三子亨鼎（1820-1900），官名忠，后改名家鼎。所谓“红单开列王元相名为首”，因此时王家五兄弟仅元相尚存，年七十四。此时元相虽然年老，但沈曰富在其七十寿辰时言，“神采之王，步履之捷，音吐之宏，饮啖之健，虽年少气充者犹或逊之”。② 显然，元相此时的身体状态依然比较好。综上，可以断定“王永义”应该是王氏经商之绸号，并非实有其人。此时王氏家族的决策者应该是王元相，但考虑到元相此时已经年过七旬，元松之儿子亨乾（官名朝佐）、亨临（官名师晋），以及元相之三子亨谦、恩寿、家鼎应该是彼时王家的关键人物。

随着“王永义”归降太平军，此时镇上最重要的势力团体演变为三部分。其一、以朱法度枪船为主要力量的团练势力，“枪船百条，团丁千余”，其背后支持者为驻扎在盛泽的吴江县丞吴翔鳞以及盛泽的传统士绅之家。其二、“王永义”为首的太平天国乡官群体，其背后支持者为驻扎在嘉兴的太平军听王陈炳文部，也包括盛泽镇的主要商人群体。其三、孙四喜所统领的枪船帮，包括所谓巢湖帮等地方势力群体。相较于朱法度之投清、“王永义”之投太平军，孙四喜对于太平军的态度则介于朱法度与“王永义”二者中间。“王永义”作为归顺太平军的主导者，虽然财产得到保护，但却没有武装力量。而孙四喜虽然没有明确投靠太平军或清军，但其模棱两可的态度，却给了“王永义”争取的空间。据《避寇日记》载，四喜“愤法大之死其父而豪横也，镇人知其衅，相与谋”。③ 显然，这里的“镇人”指的即为“王永义”，而其利用的即是孙四喜与朱法度之间的矛盾。随后，“王永义”借孙四喜之力，在镇西设立保卫局，与镇东之团练局相对抗。在“王永义”的谋划下，孙四喜联合巢湖帮最终与朱法度火并，在盛泽人沈鹏的回忆性记述中，有此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场面描述：

当洪杨乱时，江浙两省已成混乱之局，吾镇为维持治安，乡人士筹设东西两保卫局，以朱法度（大）主持，其人本系流氓，素性跋扈，曾一度击退入侵的太平军，自此更形嚣张，镇绅畏之如虎，肆意敲诈，苟一不从，即遭生杀之祸，尤对富绅王永义家，强索威胁，不堪其扰。因以另设东局以谋抵制。时有孙金彪号少骧者，年仅十六，膂力过人，且具胆识，小名四喜，其父亦颇四海，生前对于帮会中具有潜力。四喜早年丧父，曾师吾祖，尚知礼义，因即公推其出主东局，部下藉父余荫，得四毛为助，所谓四毛者，四人都姓毛也，孙父之徒，培养实力，与西局对抗。但初时较弱，故第一次东西局相斗，几至全军覆灭，四喜仅以身免，只身逃遁。旋即在外得巢湖帮之助，重振声威，而四喜本人又骁勇善战，遂率四毛诸部及客军作第二次之攻击。激战四昼夜，始击溃其主力。朱法度单身逃匿，遍搜不得，遂下令纵火烧搜，所有损失，由王永义保证负责赔偿，昭告市民。而居户以朱平时骚扰积怨之故，不敢隐护，就在一老妇家大水缸内捕获，而其余党亦悉被截获。经审讯后一并枭首示众，致东港血流成河……④

《枪船始末》亦云：“双喜求助于粮船弟兄，乘夜往攻小鸡法度而擒之，设公案于城隍

①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190 页。

② 沈曰富：《王封君七十序》，王大隆辑：《秀水王氏文献丛钞》第二编，稿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③ 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续编》第 8 册，第 260 页。

④ 沈鹏：《我的回忆》，转引自李炳华：《盛湖巨商“王永义”号》，《吴江文史资料》第 11 辑，第 171-172 页。

庙，斥以无义，责军棍数百，手断其吭，而抚其余众。”[①] 虽然记述上两者稍有不同，但结果一样，即通过此次火并，四喜雄霸一时。吴江县丞吴翔鳞也在慌乱中逃入盛泽镇的新安会馆，最后在惊恐中死去。不过，在沈鹏的记述中，此次擒杀似乎仅仅是枪船的火并，“王永义”似乎也只是一个被流氓欺负的富商。但据前文分析可知，火并冲突的虽然是枪船，但富商“王永义”及其势力团体其实才是最为关键的主导者。实际上，孙四喜也只是其利用的一枚棋子，王氏的真正目的一则在于保财，二则在于利用此次秩序之乱，趁机获取盛泽镇的政治、经济权力。

客观来说，王氏也确实达到了这两个目的。此后，“王永义”势力集团在盛泽镇上设立乡官局、筹饷总局、天章机捐局等机构，以确立其权力支配地位。同时创立厘捐、卡捐、铺捐、房捐、军柴捐、红粉捐等诸名目以广征税收。彼时，盛泽周边市镇都遭受战乱，甚至化成灰烬。“江浙商贾因南北道梗，云集盛泽，东出王江泾、七里塘，从嘉善达沪。各路商贩必由之路”，所以王氏家族的势力团体在盛泽到处设卡抽厘，在战乱中发了大财。“以斜桥堍北胜庵为牢狱，过卡货物偶有少报，即指为偷漏，锁押牢内，酷刑吊打，逼索罄尽而止。又开设公估钱庄，洋钱出进必先到庄用印，每洋捐钱七十文，未经用印者概不准用，有某生偶有一洋未用印，锁至公估庄内，打折胫骨。”[②] 而孙四喜虽然帮助其消灭了几个很重要的武装对抗力量，但并未在乱局中取得权力，各种事务“阴决于王”。[③] 这从其与太平军的数次冲突中也可以得以佐证。次年，在周庄陶煦的引荐之下，孙四喜即与清军一方重新取得联系，并和费秀元之子费金绶同拜江南团练帮办大臣杨庆麟为师。[④]

在设计清除镇上的枪船势力后，王氏势力群体基本控制了全镇的政治与经济大权，随后开始清除盛泽传统士绅之家的势力。浙江宁绍台道仲孙懋与其兄乙巳科进士浙江同知仲孙樊、堂兄乙未科举人浙江知府仲廷机都居住在马家巷，“房屋高厂，为镇中之冠”。五月王氏势力群体将其房屋查封，沈枝珊将仲家伙计宣松乔锁在北胜庵牢内吊打并缢死。七月初五日，火并消灭朱法大势力后第三天，即以令旗派稽查司张继然率领一百余人围住仲宅，时仲孙樊之子荫生仲元熺在家，闻喊声鼎沸，急开后门与家眷妇女逃至孙懋妻徐氏家内，仅以身免。其后，汪心耕、吴少溪以及军政司徐绩卿、军政司庄东甫、检点王子青之弟王兰士、沈枝珊之兄沈栗甫、沈枝珊之弟沈诚斋、监军李广廷之兄李文波、右一经政司陶云亭、局董唐茂廷等数十人毁门直入，“银洋衣饰，器用家伙，掳入汪贼天章机局者三分之二，掳入沈枝珊家者三分之一，剩下零星各物，群贼一抢而尽”。[⑤] 仲家遭受破家之难。此外，镇上其他官宦之家如原江西吉安府知府陈宗元之侄陈世彦也被逼迫至“乘黑夜冒雨携眷逃走”，最后不知所终。[⑥]

三、战后权力格局的延续与现代性

通过这场枪船火并及王家在战乱中的控制，盛泽镇的权力格局出现彻底转换。传统士绅之家遭受破家之难，而新兴的王氏家族则成为盛泽镇权力网络中的核心力量。但如果说这仅仅是战时的非常态情形的话，那战后的运作与发展则使得王氏家族在盛泽的势力控制延续了数十年。

按照《盛川稗乘》之记述，王氏家族的势力团体不仅把盛泽变成太平军经略江南的重要财

---

① 万流：《枪船始末》，《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 127 页。

②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184 页。

③ 沈云：《盛湖杂录》，“孙金彪轶事”条，1918 年铅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第 13b 页。

④ 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稿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卷上，第 13b 页。

⑤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185 页。

⑥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204 页。

源之地，同时也积极参与太平军的军事进攻。太平军攻打杭州时，邓光明派汪心耕领千余人到杭州接应，督催沈枝姗运粮助饷，“沈以河浅水涸，巨舟难行，掳抢小船七十余只，装载粮米，络绎往来不绝”。[①] 特别是太平军据守嘉兴一役，王氏家族的势力团体可谓居功至伟，甚至可以说直接关涉整个江南战局。[②] 但作为精明的商人，王氏家族并没有一味投入太平军怀抱，而是密切关注时局变化。此时王氏家族的重要人物都没有接受太平军的任何实际职务，譬如太平军在改派王恩寿为军帅之时，就认为直接由王恩寿出面可能并不合适，所以后来选择由沈枝珊为军帅，王氏族侄王子青副之。[③] 其他如王五官[④]、李广廷、仲纶、陈晋甫、马七官[⑤]、陶云亭等十余人都是为王氏家族出面办理太平军事务的主要人物。[⑥] 如此，则可达到既不直接出面又能“号令一乡”，大小事情“阴决于王”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直接可以省却战后的诸多麻烦，也是王家得以安然度过清廷战后清算的重要安排之一。

随着太平军在军事上不断处于弱势，很多归顺太平军的势力团体蠢蠢欲动，为战后生路做打算。同治元年（1862）八月，盛泽“王永义”势力的一个核心人物汪心耕最早携妇女家人及金银辎重逃至上海。恰巧的是，仲家此时获得最高功名的署严州知府仲廷机正好奉差到沪，遂将汪心耕控告至官，本以为可以好好惩治一番，没想到铁板钉钉之事居然差点将自己性命都葬送于此。关于这一过程，《盛川稗乘》有详细记述：

> 适仲廷机奉差到沪，杭城失守，不能回省销差，暂住夷场，闻汪贼来到，即欲赴官控告，汪贼亲到仲寓叩头伏罪，乞饶性命，诉称掠抢财物非一人独得，拆毁房屋系奉听王令旨，情愿赔偿房价银三千两赎命，交出黄金二百两，仲绅已应允。又有人在江北控告汪贼，疑为仲绅唆使，贿嘱土豪汪锡珪谋办赎罪。盖汪贼自知为听逆信任，凭藉凶威，数年以来，杀戮掳掠，结怨甚众，恐防群起而攻，不如多用银子，官司获胜，便可杜绝众人控告之路。汪锡珪者，已故大学士潘世恩之妻侄，在籍候选道潘曾玮之妻弟，捐纳郎中，捐戴花翎，捐三品衔，包揽词讼，把持公事，横霸一方，无恶不作，苏人呼为裙带乡绅。家本巨富，贪官污吏多与结交，知汪贼拥有重赀，且改吴为汪，遂认作己侄，劝其出银赎罪，并嗾其反噬。署臬司刘郇膏凶恶贪婪，素有刘黑天之号，为知县时即与汪锡珪交结，得受巨赃，一力主持，包庇逆匪，凌蔑绅士，讳其九门御林伪衔、刑部尚书伪职、耕天福伪爵，改称乡官，以轻其罪，不但掳抢毁拆各情概置不问，即其受贼爵、运贼饷、把贼卡、收贼捐、公然叛逆、抗拒官军、万口传扬、万众切齿之事，一概称为并无实据，反以仲廷机之控告为讹诈，札饬上海县知县王宗濂将仲廷机拘管县署，必欲详请参革。王宗濂系捐纳得官，著名贪劣，趋奉上司，百端凌辱。适有前任浙江臬台段光清来沪办盐，与仲廷机为同年，向李中丞力白其冤，中丞谕令释放，刘黑天将黄金二百两追出，令银匠熔化，嫌金色不足，指为仲绅挖换，勒其补足十成金色，亦太甚矣。又恐释放之后，仲廷机必欲上控，勒令出结，屡写屡换，遂自做一结，交王宗濂描写存案，方始释放。[⑦]

按常理言，堂堂严州知府控告一个“受贼爵、运贼饷、把贼卡、收贼捐、公然叛逆、抗拒

---

①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184 页。

②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190 页。

③ 时人记载多将沈枝珊误记为“贡生王家鼎之妾弟”，考《舜湖王氏家谱》，王家鼎并未纳妾，其原配为震泽沈氏，故沈枝珊可能为其妻弟。王子青似为王元桂之子，《舜湖王氏家谱》载：“利溥，监名志清，字培源，号子清，国子监生候选詹世府主薄。”

④ 关于“小王五官”，《盛川稗乘》载：“原任伪军帅小王五官，王永义家庶出子”；“令王元相之孙王五官把守盛泽”。考《舜湖王氏家谱》，元相共有八孙，但因“王五官”真实名字记载不详，身份待考。

⑤ 《盛川稗乘》载：“伪前营师帅马七官，盛泽人，捐纳郎中王恩寿之妻弟。”考《舜湖王氏家谱》，王恩寿“配盛泽冯氏，六品衔名承惠号麟洲女”。所谓“马七官”，似为“冯七官”之误。

⑥ 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94-196 页。

⑦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186-187 页。

官军”之人应该是手到擒来之事，况且此人还曾作为向导，带领太平军攻陷嘉兴府。不谈其在盛泽之所作所为，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置其于死地。可是在此案中，汪心耕通过七万两白银贿赂各路权贵，打通各种关节，不仅使得自己成功脱身，还将仲廷机之控告变成“讹诈”，“札饬上海县知县王宗濂将仲廷机拘管县署，必欲详请参革”。汪氏成功脱身后，复其姓名为吴清祥，后又改为吴樾，在汪锡珪引荐下，送贽见银六千两，馈献奇珍异宝，拜入潘曾玮门下。此后盛泽的大小头目如吴少溪、沈枝珊、王子青、陶云亭等纷纷循此路径，“或认亲戚，或拜师生，或管租务，或司银洋，相国门第竟成贼匪渊薮，滥充绅董，蒙保翎顶，贼官伪职悉登仕版矣”。① 作为大学士潘世恩之子，潘曾玮为何容忍如此一班人拜入自己门下？

《盛川稗乘》的作者将此视为汪锡珪、潘曾玮、刘郇膏、王宗濂等人的贪赃枉法行为，甚至大骂潘曾玮“丧心病狂，万世王八蛋”。当然，从《盛川稗乘》的记述来看，言其贪赃枉法固然无误，但其内在情形可能远比《盛川稗乘》作者所见要复杂得多。

曾国藩在写给潘曾玮的一封信中曾提及，同治元年殷兆镛、冯桂芬、潘曾玮等提出赴皖请兵时即曾筹集军费二十余万作为“征兵东援轮船之费”，而当李鸿章的淮军到达上海之后，其军费依然由在沪主要江南士绅筹集，“迨李中丞抵沪，募勇置械，需费日巨，皆赖诸君子襄办大政，同建殊勋”。迨至同治三年八月，清军刚攻占金陵，曾国藩就直接来函请潘出面在苏沪劝捐，以应军费之急需。“惟是善后事宜，百绪繁兴，需款甚巨。……特备公牍，先请阁下与苕甫兄邀同前年公函中诸君子在上海设局，劝捐银八十万两，陆续解赴江宁善后局，以济要需。仍札刘藩司、丁关道会同督催。”② 如此多的巨额银两从何而来？上海开捐征税固然是一途，但通过各种关系“花钱买命”的太平军乡官群体无疑也是重要财源之一。当然，关于这一点，仲廷机作为局中之人，似乎也知道其中之利害相关。所以后来有人劝其去京城控告，但仲氏明确表示放弃。

在《盛川稗乘》中还收录了一份同治三年的《吴江县绅士公呈》，联名控告仲瘪嘴（即仲纶）“从逆害民”之事。其署名者包括“拣选知县举人周元圭、生员张乃治、职员仲延浤、前任常州府学训导张森干、拣选知县举人陈宗恕、监生王兰湘、举人王希鳌、刑部员外郎洪文益、候选训导郑瑞清、监生仲孙桓、生员郑恭燮、孙庆棠、王壬泽、李龄寿、荫生仲元熄”等十余人。虽言吴江，实际上都是盛泽人，并且基本囊括了当时盛泽镇上取得科甲功名的传统士绅家族。其控告者虽然是仲纶，但实际上矛头直指“王永义”。《盛川稗乘》的作者亦言，“吴江绅士公呈，指出各逆款，王永义实为助逆罪首，沈枝珊乃从贼罪魁，仲纶等不过奔走效力之辈耳。乃枝珊被李广廷供出，行贿托情，置身事外，至王永义更无人敢齿及矣！”显然，这一所谓“公呈”基本可以理解为盛泽传统士绅与新兴王家势力的一次重要的面对面交锋。从目前保留的史料来看，虽然看不出王家在面对这张公呈时的态度与政治运作，但从结果来看，事情的发展似乎依然在王家的掌控之中。“仲纶入狱时，托人赴王永义求救，王恩寿商之某绅，某绅曰：‘须杀了仲纶等，王氏方无后患。’于是仲纶、李广廷相继死。”而王家子弟都安然度过此次战后清算，由此亦可看出权力格局之转换。③

战后，王氏家族开始迁居两地。王元松之子师晋率家人迁居苏州，而王元相及其他几房的子孙则留在盛泽发展。不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战后王家的势力在盛泽已经完全确立其领导者地位。

其一、从同治元年开始，元相长子亨谦、次子恩寿通过募捐善后等事务与清军统帅李鸿章形成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治元年初，随着青浦、嘉定等地陆续被收复，清军即开始设立善后抚

①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187 页。

② 《书信之七》，《曾国藩全集》第 28 册，岳麓书社，2011 年，第 83-84 页。

③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202-205 页。

恤局，“札委即补道署苏州府知府李铭皖督同前刑部山西司郎中王恩寿、候选同知徐震权等分运钱米挨户散给，按期按村周而复始，借苏残喘”。同治二年，随着清军收复地区的扩大，“饬该委员等赶紧前往，分投接济，并会商各该州县官绅设局筹捐，次第赈抚”。[①] 可见王恩寿是最早参与战后重建的重要人物之一，“随时派令接续赈抚”，已经成为李鸿章身边的“钱袋子”。同治三年七月，李鸿章为之上专折请奖：“该董等自承办以来，筹劝捐款，或由司库粮台借领银米，采购杂粮，亲赴各城乡按户点给。每于荆榛瓦砾之中冲寒触暑，冒犯疾疫，往来查勘，间值贼氛逼近，险阻备尝。迄今两载，计共存活灾黎不下数十万人，收埋尸骸数万具，实于新复地方裨益不浅。”[②] 这一保举虽然因吏部认为李鸿章的保举过多而驳回，但在同治六年，李鸿章依然保举王恩寿等五人请奖，并最终获批。[③] 元相长子亨谦虽然在办理募捐赈济过程中去世，但李鸿章在同治三年依然为其专门请恤。[④] 后得以赠知府衔，而且以一子入国子监读书，期满以州判铨选。[⑤]

其二、王氏子嗣在战后的科考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据同治《盛湖志》卷八《科第》与光绪《盛湖志补》卷二《科第》收入同治、光绪年间王家通过科考获得功名者如下：

进士：

王景贤，同治二年癸亥进士，官户部郎中。

王大钧，字伯荃，秀水籍，伟桢从孙，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科举人，二十九年癸卯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举人：

王树敏，字振声，秀水籍，景贤从子。大挑知县，分发河工，改江苏。

贡生：

王藻墀，号振之，嘉兴府学拔贡，同治十二年癸酉中式。景贤从弟，秀水籍。

王泽圻，字子封，光绪十一年乙酉拔贡。秀水籍，藻墀弟。刑部江西司额外主事。

王祖询，字次欧，光绪十七年辛卯优贡。秀水籍，伟桢子。选湖北通城知县。未任，故。

王家桂，字诜一，光绪二十年甲午岁贡。

例仕：

王景祁，号芝生，同治五年增贡生，秀水籍，景贤弟。署德清县教谕，捐升同知，知府衔。

王宝莹，字星卿，光绪□年廪贡生。秀水籍，伟桢弟。授黄岩县训导，升山西交城县知县。

王宝璐，字子莘，附贡生。秀水籍，宝莹弟。授山西静乐县知县，调兴县知县。

王祖锡，字梦麟，廪贡生。秀水籍，伟桢子。授福建将乐知县。

王大勋，字仲贤，附监生。秀水籍，大钧弟。授兵部司务，选湖北黄州府管粮通判，署宜昌府同知。

彼时盛泽镇共有中进士者 5 人，王家占其 2；举人 7 人，王家占其 1；贡生 16 人，王家占其 4；例仕 8 人占其 5。可知王氏家族在晚清科甲之繁盛，盛泽无出其右者。这些功名的获取加上家赀之丰饶，也从另一个侧面保证了王家在战后盛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

其三、王家在咸同时期搭建起来的姻亲关系网络也已经非常强大。元松一脉，师晋嗣子伟桢即娶吴江殷兆铨之女。殷兆铨为进士殷兆镛之胞弟，同治初年殷兆镛也在上海，并且是赴皖乞师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弟兆铨之女自幼为其所钟爱，“引为己女，随侍京邸”。[⑥] 王师晋去世后

---

① 《筹赈收复地方并酌请蠲免漕粮片》,《李鸿章全集》奏议（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286 页。

② 《优奖委办抚恤员董片》,《李鸿章全集》奏议（一），第 547 页。

③ 《王恩寿等仍照原保给奖片》,《李鸿章全集》奏议（三），第 33-34 页。

④ 《为王亨谦请恤片》,《李鸿章全集》奏议（一），第 580 页。

⑤ 王大隆续撰:《舜湖王氏家谱》卷 10，王大隆辑 :《秀水王氏文献丛钞》第七编，稿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⑥ 傅增湘:《王母殷太夫人八秩正庆序》，王大隆辑:《秀水王氏文献丛钞》第三编，稿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的墓志铭即殷兆镛所撰，其内云：“辛酉夏予奔母丧，平望故第毁于寇，依弟兆铨寓沪上，获交君，益服其为人。使闽还再晤。后由安徽乞假归，君豫命伟桢为予购萧家巷宅，与钮家巷邻也，过从尤数。”① 可见两家关系之亲近。朝佐长女，适吴江籍道光甲辰科翰林院编修殷寿臻之子殷兆镈。师晋长孙祖锡，配吴县籍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宝恕长女。利棠长女则嫁与工部右侍郎秦绶章。元相一脉，亨谦次女嫁冯桂芬次子冯芳植，其孙颂鸰又娶冯芳植之女。冯桂芬不仅是榜眼，在咸同之际的上海时期更是李鸿章最为重要的幕僚之一。可见，王家在战后已经建立起一个从中央大员到地方权绅的强大姻亲网络。

与元相子侄留在盛泽不同，元松长子朝佐在战乱中忧郁而世，次子师晋率领全家避难上海。战乱后，师晋率全家迁居苏州。得益于战争中所积累的财富、姻亲关系及社会地位，王师晋在率家迁居苏州后，同样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战后苏州“新士绅”的重要人物之一。王师晋治家延续其父风格，对子孙辈读书要求极严，其子王伟桢在日记中言，“椿庭日有所为，严亲必书之笔记，伟桢出告反面，不敢稍怠也”。② 正因家教如此严格，才使王家在晚清的发展有别于一般商人家庭，门第兴旺，人才辈出，“乡里之士第，观其诗书门第之盛，啧啧言之”。③ 如前所述，迁居苏州后，王家与侍郎亲家殷兆镛曾过从甚密，而殷兆镛对其侄女婿即王师晋之子伟桢则尤为器重。

师晋去世后，其家业主要由其嗣子王伟桢打理。光绪初年，河南大旱，王伟桢与其他苏州士绅多方筹资，积极办理赈济，此在其日记中记之甚详。④ 所以叶昌炽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说：“轻财好施予，齐豫荐饥，与费宫允延厘、谢太守家福首创义振，自后泛舟之粟，无役不与，吴中义声动天下，君实为之职志也。” ⑤

综上，王氏家族通过在战后科第、姻亲、地方重建等方面的努力已进入了地方大族之列，不仅在盛泽成为当之无愧的权势之家，并且在苏州也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士绅之家。反观盛泽传统士绅之家仲氏，在战后的科考中竟无一人题名。仲廷机在战后也仅仅是参与盛泽有关浚河道、葺祠宇等善举的公呈条议，而且“独于公款项谢不与闻”。⑥ 说明在地方公用事业中，仲氏也基本退出了核心舞台。

四、余论

政治变动是社会阶层变化的重要推手之一。咸同之际江南地区的战乱使得江南地方的士绅力量出现了一个明显转换。传统士绅之家多遭受破家之难，而新兴的商业家庭则通过战争中的各种政治运作，发展成战后的商绅之家。

据张仲礼对 19 世纪中国士绅阶层的总体分析，以太平天国为分界线，士绅阶层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正途”与“异途”在整个士绅阶层中的身份比例、地方官吏数量、拥有虚衔者人数等方面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动。在官吏及有虚衔者当中，太平天国前约有一半为正途士绅，但在太平天国后仅有三分之一为正途绅士，其余主要是捐纳而成绅士者以及一些由举荐和军功入仕

---

① 殷兆镛：《皇清貤封资政大夫候选光禄寺署正王君敬斋墓志铭》，载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06 页。

② 王伟桢：《休闲居士日记》，第 1 册，“光绪四年元旦”条，稿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③ 李恩溥：《貤封资政大夫王姑丈敬斋七旬寿序》，王大隆辑：《秀水王氏文献丛钞》第二编，稿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④ 如光绪四年元月二十七日记，“梦仙、淩淦生、谢绥之，陆生将集资赴河南办赈，座谈甚久。……办赈银一千两，汇费贴出五十两，山西人一无善心，可恨。”如是记载，日记中非常之多。参王伟桢《休闲居士日记》，第 1 册，“光绪四年元月二十七日”条。

⑤ 叶昌炽：《内阁中书王伟桢墓志铭》，载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第 189 页。

⑥ 仲虎腾辑：《盛湖志补》卷 2《宦绩》。

者。此外，从绅士阶层的收入来源看，绅士的商业性收入在不断增加。[①] 马敏与王先明则进一步指出这两种变动趋势都反映了同一个历史倾向，即绅、商之间出现相互渗透与合流。[②] 从对历史变动趋势的总体把握来看，这一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但从相关研究所讨论的具体内容来看，则依然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其一、从讨论的时段来看，目前论著多聚焦于清末民初之际，而对于咸同之际商绅家族兴起之初的情况则论者寥寥，也鲜见绅商家族崛起的细致案例。其二、或者是囿于资料等原因，对绅商群体的研究多为大城市上层绅士之行迹，对下层商绅则少有论及。

就江南而言，晚清湖州南浔镇出现的“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墩狗”现象，曾作为近代绅商兴起的典型案例得到学者广泛关注，但因缺乏关键的家族性史料，所以大多只能依靠民国《南浔志》等些许记载，对这一群体做总体性叙述。[③] 本文通过咸同之际盛泽镇权势格局转换的细致考察，为探源晚清绅商阶层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同时也揭示出晚清基层社会权力的结构性改变虽然要到清末新政与科举废除之后，但咸同战乱后这种权力群体的内在变化已经顺应了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发展。

咸同以前，盛泽镇上的仲氏家族在数百年间通过科考延绵不断地取得功名，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势之家。但咸同战乱中政治秩序的变动，改变了这种传统科甲之家独掌权势的局面。乾隆年间迁居盛泽的秀水籍王氏家族通过王元松、王元相兄弟在嘉道年间的经商而致富，在咸同战乱中，主动率众投诚太平军，这不仅使盛泽免遭战火，也让王氏家族在镇上的权势变得独一无二。在此动乱中，仲家遭受破家之难。王氏家族则在战后通过通天之财力、积极参与战后重建、姻亲网络的构建、科第成功等因素成功使得这一权力格局得以延续，并发展成为亦商亦仕的商绅之家。这种权势格局的转变，不仅是王家积极运作的结果，更是一种现代性的展现。由于战乱后江南所面临的“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④] 的局面，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士绅群体来参与社会重建。但由于传统士绅之家已多遭受破家之难，他们不再能为重建提供最急需的资金来源，加上官府资金的匮乏，战乱中暴富的商人几乎成为当时唯一有能力进行战后重建的群体。“慈善”在战后成为了商人群体展演的重要舞台。而捐赀所带来的另一层好处则是功名的获得，商人之家顺势转变为商绅之家。通过姻亲等方式，又与传统士绅之家结合在一起，交织起一个错综复杂的亲属网络。

要之，在传统士绅之家于战乱中“几成绝户”的情况下，以盛泽王氏为代表的商人家庭，通过战争中的乾坤转换成为了地方上的重要力量。这种在战争中通过资本与权力结合而出现的“新士绅”实际上是战后所兴起的商绅群体的重要来源。换言之，近代商绅群体的出现，太平天国战争所导致的社会阶层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References

Chen Ling. “Guimen zhiwai: Xiantongzhiji jiangnan caiyuan de zhanzheng jiyi yu zhanluan yanshuo” (Beyond Boudoir: The war memories and speech of talented women in Jiangnan during Xianfeng-Tongzhi period in the late Qing

---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95-115 页、第 358-360 页。

② 马敏：《官、绅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80 页；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16-121 页。

③ Mary Backus Rankin. “Rural-Urban Continuties: Leading Families of Two CheKiang Market Towns”, *Ch‘ing-shih Wen-t’i*, vol. 3, No. 7(1977). 陈永昊、陶水木主编：《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团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郎永兴：《镇政的现代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27-444 页；郑卫荣：《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适——以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中心》，《浙江学刊》2007 年第 2 期等。

④ 《筹赈收复地方并酌请蠲免漕粮片》，《李鸿章全集》奏议（一），第 286 页。

dynasty). *Zhejiang xuekan*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1 (2018).

Chang Chung-li. *Zhongguo shenshi yanjiu* (The Chinese Gentry). Shanghai: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Luo Jing. *Jiangnan shizhen wangluo yu jiaowangli -- Yi shengze jingji shehui wei zhongxin (1368-1950)* (The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power of Jiangnan towns -- taking shengze's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as the center).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0.

Luo Jing. "Jin sishi nian lai shengzezhen yanjiu zongshu" (Review of the case studies of the market towns in the lower Yangtze delta during the last forty years: taking shengze as example). *Sha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 (2005).

Lang You-xing. "Zhenzheng de xiandaihua: Nanxun zhengzhi jiegou zai jindai de yanji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town: a case study of Nanxun). *Zhejiang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1 (2003).

Mary Backus Rankin. "Rural-Urban Continuties: Leading Families of Two CheKiang Market Towns", *Ch'ing-shih Wen-t'i*, vol. 3, No. 7 (1977).

Wang Xianming. *Zhongguo jindai shehui wenhuashi lu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Yang Xi. "Juluo yu jiazu: mingdai zidicun de quanshi yanti yu diyu xingsu" (Settlement and family: power succession and shaping region in the Zidi villag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Shilin* 2 (2016).

Yang Xi. "Mingdai zhonghouqi jiangnan shehui bianqian yu shizhen quanshi gengdie -- yi jiangyinxian chengjingshi wei zhongxin" (Social changes and transfer of power in the market town of Jiangnan area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A case study of Changjing Town, Jiangyin). *Sha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 (2017).

You Huansun. "Chong shichang dao quhua: Qing zhi minguo jiangnan shizhen yuqu bianqian -- yi shengzezhen wei li" (From market to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he changing of the space range of Shengze from Qing dynasty to Republican China). *Xueshu yuekan* (Academic Monthly) 9 (2013).

Zhao Shiyu and Sun Bing. "Shizhen quanli guanxi yu jiangnan shehui bianqian -- Yi jinshi zhejiang huzhou suanlinzhen wei li" (Power relations in towns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the case of the town of Shuangl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indaishi yanjiu*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 (2003).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Shengze Township during the Xianfeng-Tongzhi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EN Ling (Center for Jinggangshan Studies,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chenlinggood@163.com)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local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power structure of Shengze Township experienced a fundamental change during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s. The power of traditional gentry families, which was marked by succ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as broken and destroyed during midcentury warfare. On the contrary, the emerging merchant families mastered the post-war power structure of Shengze Township relying on various political maneuvers.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of Shengze township during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s, this essay provide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fortunes of the gentry and merchants classes in late Qing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veals how the struggles between gentry and merchant families not only changed the economic network of the Jiangnan region, but also fundamentally reconstructed the power structure inside the town.

Keywords: The Yangtze delta, Shengze Township, political change, power substitution